



威撫畿疆

近代直隶与 现代河北

邢焕林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威撫畿疆

近代直隶与现代河北

邢焕林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直隶与现代河北/邢焕林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12

ISBN 7-202-03239-2

I. 近… II. 邢… III. 河北省-地方史-近代
~现代 IV. K2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9177 号

书 名	近代直隶与现代河北
-----	-----------

作 者	邢焕林 著
-----	-------

责任编辑	李文龙
------	-----

美术编辑	李 欣
------	-----

封面设计	馨 宇
------	-----

责任校对	张三铁
------	-----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	--------------------------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厂
-----	---------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	------------------

印 张	9.75
-----	------

字 数	183000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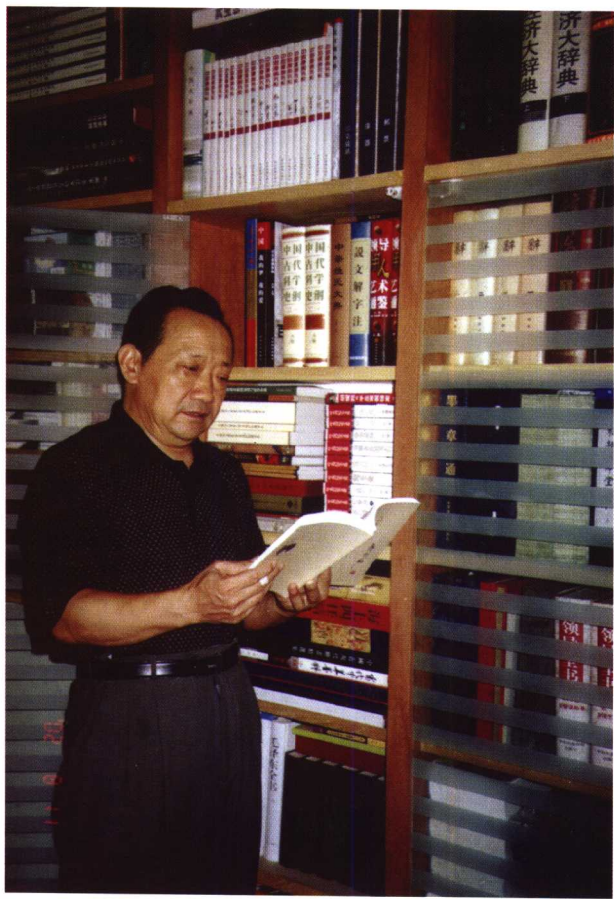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1—3000
-----	--------

书 号	ISBN 7-202-03239-2/K·738
-----	--------------------------

定 价	16.0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邢焕林 生于1945年2月，河北省东光县人。河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在石家庄地委党校、石家庄地委宣传部、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工作。曾发表过有关政治理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和研究河北历史问题的文章。

序

2002年春节前夕，邢焕林同志与我谈及他打算把自己参加工作几十年来所写的东西作一番整理，从中遴选若干篇代表性的文字出一本书。邢焕林同志长我9岁，我们先后在河北大学读过书，他学历史，我学哲学，是我的师兄。他在省委宣传部工作多年，由干事而副处长而处长而秘书长，后来又调到河北省新闻出版局任副局长，是我的顶头上司。我1982年春天走出校门，到河北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因为工作需要，经常与省委宣传部的同志打交道，很早就认识了他。与他最初的接触没有什么特殊的印象，只是记得1988年省委宣传部交我社出一本书，责任编辑看稿时改动了若干处。我当时是分管副总编辑，和责任编辑一起到部里与作者交换意见时，邢焕林同志不大高兴。那时他是省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具体负责这本书的撰写工作。近20年的交往时间不可谓不长，回想起来又“平淡如水”。我只知道他是宣传口的笔杆子，写过许多与他的工作性质相关联的文字，听多年为他差遣的省委宣传部原办公室主任、现《共产党员》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杨曼军同志神聊，邢焕林同志清心寡欲，没有什么爱好，不打麻将不会下棋不爱唱歌不跳舞，但有一个特殊之点，“只要一看见材料眼睛就放光芒”，是一个写材料、看材料、改材料上瘾的人。一个如此钟情于文字的人，确实应该回过头来，审视总结一番——在听邢局抒发情怀之时，我心里这样想着。

没承想，他把写序的差事交给了我，而且说得郑重其事。我虽然含糊其辞地应承下来，心里并不大当真，以为是此乃一时情重之言，过后他会慎重考虑、另请高明的。谁知春节之后，他重提此事，并且将整理好的稿子一并给了我，让我过目。这使我感到十二分的惶恐。近年来，整理旧作结集出书已成一时之风尚，请名家请领导题词作序者不可胜数。我不过是一名职业编辑，默默无名，又是其部属，人微言轻，自古皆然，他怎么会舍高明而就轻微，真的让我来做这件事呢？惶恐之余，我反复思索，终于想通了师兄的真意，不愿随波逐流的真意。为了不拂他这一难得的雅意，我不揣冒昧，接受了这桩差事。

在一个星期天，利用办公室难得的宁静，我打开了他的书稿，决心认真拜读一番。没承想，这一拜读又让我大吃一惊：我原以为师兄在宣传部门效力多年，他的集子应是宣传文字居八九，没想到我以小度大，犯了经验主义的通病，错估了这本集子的内容和分量。这是一本近乎严格的河北近现代史论专集。

书中收集了13篇文章，从1977年起至2001年止，时间跨度达20多年；内容涉及辛亥革命之直隶革命史，近代直隶的农村经济、工商企业、工人运动，河北人民革命斗争史，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河北的重要活动，毛泽东对河北公社化初期活动的调研指导，以及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等等。这些文章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几篇文章，笔锋专注于近代河北。作者在“后记”中交待说：当初他“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计划，打算先从研究河北近代的企业、农业、历史人物、革命斗争入手，给全面研究河北近代历史打下几根坚实的桩，而后再谋篇全局，把近代河北的历史搞透”。对于一位学者来说，这虽然算不上是宏志大愿，却也目标明确，方法对头，切实可行。由个别而一般，从研究近代河北历史的个案入手，以搞透近代

河北的历史为目标，作者的这个计划以及他所发表的论文、所打下的这“几根坚实的桩”，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都表明他在向着自己制定的目标稳步前行。倘若坚持下去，他是有可能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河北近代史权威，成为一名为人敬重的专家学者的。仅从“辛亥革命在直隶”一文对辛亥直隶革命党人活动情况的介绍及举义失败原因的分析探讨，即可看出作者的研究功力之深厚。读书中关于近代河北的企业、农业、历史人物、革命斗争的研究文章，则可以看出作者在80年代的前期，是确确实实实践着自己的计划，认认真真地做学问、搞研究的。那时的他，三十出头，四十不到，精力充沛，勉而好学，志向崇高而尚未走上领导岗位，是一位“有血总要流，有火总要喷，在任何方面都想要驰骋”（郭沫若语）的知识分子。

从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对于文字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执著，所著各文都注重史实，注重考证，从而使他的或以学术性见长或偏重知识性介绍的文章都像他本人一样，给人以一种一丝不苟的严谨印象。或许你不大容易从中找出感染力极强的令人拍案叫绝的语句和段落，但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些文字背后花了不少功夫用了不少心思。“河北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一文，是作者与其他几位同志合作完成的国家“九五”社科重点科研项目。在这篇长文中，他与他的合作者们把这个很难写的题目写得非常之平实，非常之充实，使这篇研究现实问题的文章同时带有史学文章的风貌，这一方面得益于作者多年从事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另一方面得益于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力。

由于作者走上了领导岗位，他的那个“不大不小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落实而于中途搁浅了。如果他能实现自己的预定计划，那么他的著作是会一本接一本地出下去的。这不仅让作者遗憾，也让读者遗憾。令人欣慰的是，生活中的邢焕林

同志有一种可堪称道的奋斗精神，他不相信走仕途和搞专业是矛盾的，“总想把它统一起来，双管齐下，求取两全”。尽管他忙里偷闲考据研究写文章，总想做点学问，但宣传部门的繁重工作却使他不能不牺牲自己的爱好，而把主要的精力用到没完没了的写材料、看材料、改材料上面。景况如斯，真有点熊掌与鱼不可得兼的苦涩。于是乎，他后来的“学问”文字少了，那个“不大不小的计划”也中途搁浅了。他在材料上下的气力最大，用的时间最多，但在这本书中，他却没有收进其中任何一篇。我曾就此问过他，他淡淡一笑，语气平静而又果断：“我不想在这个集子里收那些东西。”我想，他这是和以往干别的事情一样，追求的仍然是一丝不苟的严谨。

古语有云：“取法其上，仅得其中。”不能得其上而仅得其中当然让人惋惜，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有多少志存高远者结果未得其中而仅得其下？从这点来看，能得其中也很不错了。用一个学者的标准来衡量，邢焕林同志的学术追求似乎可以用这句古话来概括。

我对史学是外行，不敢对师兄的学术观点妄加评论。我战战兢兢，以一个职业编辑的真诚，写了上面这些话，权为引玉之砖。信笔至此，我突然想到：我的这段文字放在这里，会不会像一块旧布缝在一件高档时装上面一样，让人啼笑呢？倘若真有这种效果，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反衬师兄的雅作，也未尝不是一桩幸事。相信读者会从本书中读到应该读到的东西，做出应该做出的评论。真诚地希望我的可尊重的邢师兄在几近耳顺之年能焕发青春于著述者之林，“重整旗鼓，再续史缘”，写出新的好作品。

是为序。

李保平

2002年5月1日于随想斋

目 录

辛亥革命在直隶·····	(1)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直隶革命运动·····	(35)
浅论辛亥革命时期吴禄贞的活动性质·····	(52)
近代直隶企业述略·····	(69)
近代河北农村经济浅谈·····	(92)
近代直隶工人队伍状况述略·····	(116)
光耀千秋的英雄壮举 ——记近代河北人民的革命斗争·····	(130)
毛主席在西柏坡·····	(169)
刘少奇在平山指导土改整党工作的调查·····	(179)
20 世纪中叶社会转型时期河北的政治与经济 ···	(184)
毛主席对河北公社化初期活动的调研与指导·····	(202)
河北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简史·····	(212)
河北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252)
后 记·····	(303)

辛亥革命在直隶

一、辛亥革命前后直隶各革命团体的继起及其活动

直隶（今河北省）处于清廷周围，“天子”脚下，是封建专制主义高度集中的地方。在这里，封建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相勾结，把中国人民推进了灾难沉重的深渊。地处京畿的直隶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蹂躏和压榨尤为惨重。但是，具有革命斗争传统的直隶人民，在义和团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曾大显身手。随着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壮大，直隶的一些革命志士也积极投入到这一运动中来。辛亥革命以前，就有不少人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且组织了一些革命团体。武昌起义爆发后，随着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和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直隶革命党人和革命团体就更加活跃起来。

铁血会就是当时北方有名的革命团体之一。1894年清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遭到惨败，激起了广大人民的革命运动。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了同盟会，倡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当时，直隶丰

润人丁开嶂于日俄酣战之际，在北方建立了抗俄铁血会，并且发表檄文，要“为我国报深仇雪大耻，树我完全独立之旗”^①。1907年丁开嶂在丰润青坨庄成立振武社，作为铁血会本部。丁开嶂任总理，丁东第协助。并建立了京东、京北、边外、关东铁血会四个支部。武昌首义后，丁开嶂将其铁血会成员分为京东、京北、边外、关东四部军。铁血会会员“东走关内外，西游京、津、通、张，促其各部军”^②准备起义，促进共和，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1906年，蠡县陈幼云（兆雯）先生从日本弘文学院毕业回国，在保定建立了同盟会河北支部。次年冬，他联合十几位同志在保定西关创办育德中学，并任该校校长，培养革命青年，把该校作为同盟会在保定秘密集会的场所。在他的教育和直接指导下，很多青年后来奔赴九江、太原、昆明、北京等地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倒袁和倒曹之役。武昌起义胜利后，保定“各校停课，育德中学就变成保定一带革命的总机关”。^③有不少人在这里学习装配炸弹技术，准备起义。“当时大家都极为兴奋，认为数日之内国事当大有变化”^④。驻保定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之后，保定同盟会会员进行阻碍官军南下的工作，一些革命党人深入到任丘、完县、雄县、蠡县等地，宣传革命思想，组织起义。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京、津之后，居留在这里的革命党人乘机活动起来。以李石曾为首的北京革命党

人利用半公开的组织“义兴局”进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动。在天津，不少学校和附近州县也涌现了革命团体七八个之多。辛亥9月间，天津女师和政法学堂的地理教员白雅雨（名毓昆，南通人）和学生胡宪（字伯寅，河南人）等人组织的共和会，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参加的约有20来人，公推白雅雨为会长，胡宪为副会长，机关设在老西开天主教堂前面广场东边的小平房内。共和会曾多次研究策动滦州新军举义的问题，并派会员凌钺、张良昆、王葆真等人赴滦州鼓动革命。后来滦州起义爆发，不少会员参加了战斗，失败后惨遭杀害。

由于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当时在北洋新军中也出现了一些革命团体，秘密进行革命活动。驻滦州的第二十镇管带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等人，为了传播革命思想，联络革命同志，就和郑金声、王石清、岳瑞州等人发起组织了武学研究会，公推冯玉祥为会长。武学研究会采用读书的形式，密图举事。后来参加的官兵竟达1500余人。由于加入的官兵越来越多，风声过大，不易保密，冯玉祥等人又另设山东同乡会。武学研究会转入隐蔽活动。同乡会有计划地推举反动军官潘矩楹为会长，利用他作招牌，遮人耳目，掩护武学研究会的革命活动。后来，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等人都成了滦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活动在直隶的各革命团体和大批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前，他们的活动主要是传播革命思想，读一些进步书刊，提高民族革命的思想意识，做好起义的思想准备

和组织准备工作。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的活动，由宣传鼓动转到了直接发动和组织起义。当时京、津、滦、保、通、张家口等地的革命党人多次秘密集会，有的深入下去直接发动起义，有的打入新军内部策动起义。

直隶各革命团体和革命党人的活动不是孤立的。南方的革命党人在取得武昌起义胜利之后，就非常注意组织和发动北方革命的问题。1911年11月12日，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在武昌宴请京、津、保各革命团体代表，研究南方革命党人北上问题。当晚，人们感到，“为革命安全计，惟有北上，动员京、津、保、滦、通军民响应革命，推翻清室，动摇袁氏根本，实为目前迫切要图”^⑤。席间，黎元洪派胡鄂公北上。11月14日，胡鄂公渡江至汉口，乘怡和公司轮船东下，11月24日到达天津，住在紫竹林长发栈。当晚，与在津革命党人孙谏声、华朗轩、陈之骥、胡伯寅、李孝通、白雅雨、凌钺等人聚会，讨论京、津、保、滦、通等地如何组织和发动起义的问题。

胡鄂公自1911年11月24日到津，至次年2月下旬离去。在三个多月的期间内，为了推动北方革命的发展，他在天津搞了一些宣传、组织、筹饷等工作。1911年12月14日，由胡主持在天津小白楼成立“北方革命协会”，到会的有同盟会、铁血会、振武社、急进会、克复堂、北方革命总团、共和革命党、北方共和团、女子北伐队、女子革命同盟等组织的代表18人，以“协助革命军北伐，崇奉孙先生三民主义”为宗旨，并订协

会简章九条，作为各团体联合的基础^⑥。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27日，胡鄂公组织了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和津军都督府，并制定了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大纲，对总司令部的职权范围、任务做了具体规定。由于时间较短，各地党人多是分散活动，这个组织没起什么作用。2月12日清廷退位，孙中山先生向参议院辞职，17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民国临时大总统。于是北方各革命团体代表在天津吉祥里14号开会，议决“所有各团体革命活动，自本日起，一律停止或解散”。^⑦自此，北方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宣告终结。

二、“士官三杰”密谋联合和滦州“兵谏”

辛亥年间，全国革命风暴接踵而起。清廷为向革命示威，挽救垂死的命运，决定这一年在永平（今河北卢龙）举行秋操。这次秋操分东西两军对进演习。东军由秦皇岛沿海一带登岸西进；西军由通州方面东进。战时东军先胜，最后胜利归于西军，并进行总阅兵式。西军将士多是满人，东军将士多系汉人，预计这么一种结局，目的是在夸耀满洲人最终是不可战胜的，借以稳住大清朝“万世一系”的江山。这次秋操以载涛为大元帅，派冯国璋为东军总统官，以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为辅；西军以舒清阿为总统官，禁卫军军谘官田献章、哈汉章辅助。参加秋操的队伍，禁卫军为第一、二、三混成协；新军为第一、四、六、二十

镇及第二混成协（协统为蓝天蔚）。限定10月上旬禁卫军集中开平待命，新军集中滦州待命。

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三人倾向革命，志趣相投，过从甚密，曾有“士官三杰”之称。“三杰”认为，永平秋操是可以利用的好机会，于是和“诸革命同志秘密议决，乘此秋操，新军实弹射击，先将禁卫军扫清，再整军入京，密约武汉同时举兵，使清廷首尾难顾，一举灭之”。^⑧10月10日，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本镇各军官佐，行抵昌黎县崔庄，冯国璋驻兵团山。当天晚上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见势不妙，即急电停止演习，并召冯国璋先返北京，统筹编制之策。11日清廷令二十镇混成一协暂住滦州听候调用。内定第二、四两镇和第六镇一协编为第一军，由陆军大臣荫昌统领。第二十镇和第三、五两镇各一协与驻奉天的第二混成协为第二军，由冯国璋统领。第一镇及禁卫军为第三军，由载涛统领。第一、二两军赴前敌作战，第三军留守京城，以备后援。因此，令集中滦州待命的新军各返原防，听候调编调用。从各地来到滦州的新军相继离去。只有张绍曾部拒绝受命，按兵不动。

10月13日，张绍曾在京探得调编的消息后由京返回奉天，立即约集第三镇统领卢永祥、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本镇统领伍祥贞、潘矩楹谋划。张绍曾当时宣言：“湖北兵变，为除专制，主共和，以此倡义号召天下，凡属同胞，谅皆赞助。今吾辈所统各部队，半属北人，虽未预约同谋，应皆晓以斯义，倘冒然而往，胜则

自残同类，负亦死无指名。”^⑨因而打算用兵力要求清廷立宪。

当时，清政府为应付武昌起义，已经十分吃力。荫昌率领的第一军战事不利，张绍曾又按兵不动。这使清廷更加惶惶不安。“此数日中，清廷无日不檄电飞驰，促其拔队前进”^⑩，张绍曾将奉天所有步、马、炮各部队以及装械子弹组织完备之后，于10月20日带往滦州。当时陆军部已派人由京带车辆来滦，敦促张绍曾迅速赴鄂救援，张绍曾当着众人说：“湖北革命，名正而言顺，专尚征讨，不合人情，况以同种相残，世界无此蛮行，所有军队，均不前进。”^⑪28日，张绍曾便领衔通电，提出十二条政纲。这十二条政纲是：

（一）大清皇帝万世一系。

（二）速开国会，本年内召集议员。

（三）改定宪法，经国会议决，以君主之名义宣布之。

（四）宪法改定提案之权，属诸国会。

（五）全国海陆军归皇帝统帅，但对内使用，须遵守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

（六）格杀勿论、斩舍御免、就地正法、死刑等律，不得以命令行使之。又对于一般人民之违法监督，不得随意逮捕。

（七）国事犯之党人一律特赦，并擢用之。

（八）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之，以皇帝敕任之。又国务大臣由内阁总理大臣推任之。但

皇族永远不得充内阁总理大臣。

(九) 人民负担之增加及关于媾和等国际条约，经国会议决以君主之名义宣布之。

(十) 凡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之前，不得照前年度预算支出。

(十一) 上议院议员以法定之特别资格，由国民公选之。

(十二) 现时规定之宪法、国会组织法及国家一切重要问题，当解决之际，军人有参与之权。^⑫

张绍曾的态度非常强硬，“随遣使赉立宪条件于清廷，迫其停战，令速行宪政”^⑬。

张绍曾在电迫清廷要其接受立宪条件之后，又扣留了清政府从东北运往湖北前线的大批军火。这批军火启动之前，押运军火的革命党人彭家珍就密电张绍曾，“珍等恭逢运输之役，苦无挽救之方，军火到滦，望公等妥为保护”^⑭。绍曾得电，即将军火扣留。他一面电告清军咨府，军火“暂留滦州，借示革命可以调停之证”；一面电告武汉革命军黎元洪、黄兴、宋教仁、汤化龙、孙武等人，“使知后顾之忧，尽力支持，以期达到革命之目的”^⑮。军械留滦，清廷非常着急，于是让冯国璋、段琪瑞等电达张绍曾，进行恭维、恫吓，诱其放运军火。清廷又恐冯、段等人的电报不能立即发生效力，而后又让章远采等致电张绍曾“请速令前日扣留之军火，即日放运为盼”^⑯。尽管清廷进行软硬兼施，但都遭到张绍曾的拒绝，局势立趋紧张。